吃的至樂

劉荒田

友人問我，什麼是你最近的「至樂」？我想也不用想，端出這個情節：每天上午，走出羽毛球場，是十一時多一點。剛才揮拍，儘管技術之糟糕，引來全館老小的側目，但「流汗」這一基本宗旨是漂亮地實現了。背着不輕的球袋，進菜場買菜。回家路上，一隻乃至兩隻手都拎着購物袋。

即使這般模樣，還是在路旁的點心檔前停下，買一杯豆漿，一塊餅子——要麼南瓜餅，要麼韭菜餅，要麼綠豆餅。攤檔的後面是店，新開的，兩口子是湖北人，男當家在裡面製饅頭、包子，蒸籠上老冒熱汽。老闆娘主外，矮胖，機靈，勤快，一邊招呼客人，一邊把煮熟的韭菜揉進麵粉團去。「豆漿是自製的？」「當然咯，現磨！」她乾脆地保證，儘管我沒看到相關設備。這家開了才幾個月，和它隔三個舖位，去年有過一個包子店，山東漢子經營的，不知是自己打回老家去還是租金猛漲難以爲繼，春節以後關張。他賣的豆漿眞是現磨的，我親眼看着泡漲的黃豆變爲白色的汁液。新舊二店有共同處——豆漿都賣一元一杯。

一手拿着紙杯子，用吸管喝微溫的豆漿，另一隻手拿微溫的餅子，往口裡送。穿過密密麻麻的地攤，在垂柳紛披的河岸信步而行。如果說這也值得提，那就是形狀「粗俗」，當街大嚼，狼狽的吃貨！才一塊錢的南瓜餅，放在別的場合，如正規的午晚餐，是上不得枱面的，味道不怎麼樣，而且賣相欠佳。此刻，吃它一如龜裂的稻田灌進了水，酣暢自不待言，恰到好處的韌和糯，教我想起此生最最過癮的大餐，如知青年代，寒夜裡一坨燒焦的、表皮溢出黑色醬汁的紫番薯。居然忘記了「吃」所潛藏的巨大風險。油膩的餅子，是不是地溝油煎的？豆漿是不是什麼「精」稀釋而成的？發酵粉不會是工業原料吧？幸虧這攤子沒賣黑饅頭，如果黑得太地道，我不能不聯想到墨汁摻在白麵中。再想想，店內，一袋袋麵粉和白砂糖，都是碼在地上的，每天打烊後，老鼠和小強難道不吃個夠？——可是，我全忘記了，事後也不後悔。小時候老奶奶教的「不乾不淨，吃了沒病」，依然是無往不勝的符咒。

古人有問答：何物下飯最佳？答曰：餓。高強度運動以後的胃口，使原始的本能復歸。狼吞虎嚥，是何等美妙的享受。人說「色膽包天」，然而「色」以飽暖爲前提，在大饑荒年代，兩腿浮腫的男人絕對是柳下惠。生存的第一義是吃。而我這一代，少年時在餓死的邊緣走過，什麼沒吃過？土茯苓、羊角扭、木薯湯圓、「高產飯」、豆角葉、稗穀，這還算走運。不曾吃觀音土、竹子花、人糞，乃至易子而食，若然，今天已是荒墳下的枯骨。是故，成語最好改爲「食膽包天」。

對着手裡的南瓜餅，感恩無限。人生至此，夫復何求？還能在球場跳躍的身軀，還能吃粗糧的嘴，對「不管吃什麼」都很少排斥的腸胃。我差不多有了該有的一切，在這個什麼禍事都可能發生的歲數。差不多又是定規，走到大街旁邊，等候綠燈，正好把豆漿和餅子都報銷，塑料紙袋和紙杯子都塞進同一個垃圾桶。

昂然過街，健步走向菜市。下一步，還是爲「吃」服務。這一程，我記起十三歲的酷暑，和最要好的同窗木（昨天他從J城來，和我一起打球）在家鄉的田埂旁邊一個小浜捉魚。渴了從稻田一角掬起帶水草和小魚的水，咕嚕咕嚕地喝，肚子居然沒疼。那水，就是彼時的「豆漿」。五十多年過去，那天在鐵桶裡活蹦活跳的鰍魚，依然是新鮮的話題。又記起二十歲那年，進山打柴，歸途挑着一百多斤的柴草，在山坳歇氣，每個人打開從家裡帶來的飯菜，早已又冷又硬，它就是青春的「南瓜餅」。酒色財氣都是子虛，唯強盛的生命力，是最可靠的憑藉。

讀古蒼梧的《舊箋》

關 平

古蒼梧的《舊箋》是一本具野心的作品，作者大膽嘗試把兩種相異的體裁：文學創作及社會歷史敘述結合起來，通過一系列的舊信箋，向讀者展示上世紀六十年代一群熱愛文學、藝術和思想的大學生的生活面貌。

《舊箋》的主要內容，是一個女孩子寫給一個男孩子的十五封信，通過信件的文字，正面或側面描繪出幾個男女之間開始萌芽又似有若無的一段感情。故事中的幾個男女朋友關係複雜，寫信的女主人翁是海媞，她大概對一個男孩子子明有好感，於是互相通信。兩人之間是另一個男孩子朋友博文，子明大概是個同性戀者，對博文有好感，也想把海媞的感情交給博文。三人之外還有海媞的好朋友綠袖子，和子明的同學維聖。

信箋寫得平實，生活性很強，帶有淡淡的哀愁和感嘆，字裡行間顯示出當時大學生的生活和思想、包括生活瑣事，如看電影、拍超八mm實驗電影和露營遠足，上課、聽講座、編刊物等典型大學生活，以及對周圍發生的一些社會事件的看法和反思。尤其是我這一代人，年輕時的歲月與《舊箋》接近，更能感受時代的魅力，讀來更加感到趣味。

與此同時，作者又利用其中一個過來人——博文，以旁觀者的角度，去敘述和解釋這系列信箋的社會思想背景，試圖爲讀者解開當時經歷的大時代的風貌，把信箋放進當時在香港發生的「五月風暴」事件，再加上幾個當事人間面對的個人性別取向與同性戀問題，發掘當時社會對兩個主要議題的討論和看法。

把文學創作及社會歷史敘述結合起來很有重要性，文學創作並非坐在雲端，大學生活也不是純粹花花蝶蝶。《舊箋》中當時大學生對國家民族、對社會時事、對時代思潮的看法，都受到周圍的環境影響，這種結合如果恰當，正是對一代人成長和思想歷程的最佳註釋。但註釋需要有特定時代基礎，不能隨便就着模糊的大時代概括當時人物的思想去做文章。時代一錯，對信箋涵義的註釋便落空，以理害情，成爲硬傷。

《舊箋》是很難分類的作品，信箋本身應列入文學創作，以文字和感情吸引。但書中在每封信箋之後，卻借博文之手，加了不少文字的註釋，揭開信箋寫作背後的社會歷史背景。可惜這些意圖幫助讀者了解文學創作的註釋對當時的歷史有所混淆，把歷史事件的時序弄錯，可能反而把讀者帶入歧路。如果《舊箋》的文學創作部分出色，註釋發生錯誤便難免損害文學創作部分的價值了。

這裡且舉一兩個例子以作說明。如第二封信的註（四），談及編學生報有導師審查，筆鋒一轉，提到《新亞學生報》的編輯因校方審稿，發生憤而抽稿的「開天窗」事件，博文的註釋把校方審稿「開天窗」，歸咎於該報較早前刊出的兩篇文章：《哭新亞》和《爲自己哭吧》，引致校方進行「獵巫」。不過，該信的紀時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哭新亞》和《爲自己哭吧》是歷史事實，舊學生報可以找到，刊登於一九七一年底的《新亞學生報》。兩件事件相差四年多，發生日子對不上。如果註釋是爲了解釋當時新亞校方的嚴厲管制學生的言論和文章發表自由，這種錯誤會大大減低註釋的說服力。

又如第六封信的註（四），談到「五月風暴」事件，信中認爲參加者是工人，爲自己爭取權益，傳媒報道稱他們爲「暴徒」並不應該。博文的註釋提及海媞畢業於庇利羅士中學，可能因該校有十餘學生在「五月風暴」中，因參加運動被捕，海媞此說是同情師妹。但該信的紀時是一九六七年六月，庇利羅士中學十四學生因與校方衝突被捕判刑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被捕判刑發生在信箋之後，海媞寫信時不可能預測到日後的被捕判刑，註釋是錯解了海媞的用意。

書中還有兩個小錯誤，有機會再版時希望修正。第六十六頁提到的當時著名言情小說作家「伊」達應作依達，第六十八頁提到的當時大影會成員，後來曾去荷里活拍電影的大導演吳「汝」森應作吳宇森。

我一向愛讀古蒼梧的作品，文字優美，感情溫文爾雅，《舊箋》把兩種相異的體裁結合起來並非輕而易舉之事，所以我開宗明義說，這是具野心的嘗試。可惜，嘗試並未成功，仍有待作者努力。

窮不過三代

楊繼良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初，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刊登了一篇講述美國之夢的文章，文章把從底層社會（二口之家年收入在貧窮線一點五萬美元以下）爬升到中產階層（年收入在一點五到六萬美元之間）的流動程度，稱爲「經濟流動性（economic mobility）」，實現這一爬升，就實現了美國之夢，其關鍵在於教育。教育程度高，收入才會增加。即使在十二年義務教育制下，富裕家庭能給小孩提供更好的教育環境，也能有更多時間教育小孩，窮人家庭的孩童就無法得到這些資源。因此，社會的貧富差距越大，這一流動性也就越低。同一天，奧巴馬也分析說，經濟流動性的減弱必然使中產階級縮減，是當代最具挑戰性的問題，他的藥方是努力縮小貧富差距，包括增加就業、提高最低工資、全民醫保、改變當前企業高管收入相當於普通職工二百三十七倍和國民收入的半數被百分之十的人所佔有等現狀。總之要縮小貧富差距，才能提升經濟流動性、使更多的人能實現美國夢。

中國人的諺語說「窮不過三代」，意指窮人改變自己的境況、實現這一爬升，經過三代人的努力一定能達到。我們在此結交的中國朋友，都是八、九十年代揣着五十美元來到這裡打工攢錢讀書、謀生者，辛苦五到十年，都爬到有房有車的境地。二十五年前，我遇到一個從中國來的青年，他在舊金山下飛機，拖着行李，沿大路走，看到有華人開的小飯店，就挨家去問，是不是能僱用他。他只求晚上能在店堂裡睡覺、白天有飯吃；幹什麼、給多少工資，都行。半年以後，他開始在成人學校保持自己的合法學生身份，然後全力打工攢錢。我想，兩、三年後，這個小伙子一定成爲一個正規的大學生，如今早已擠入中產階層了。表面看來，似乎一代人就可以實現美國夢。

前天和我的女兒在電話中聊天，她談到她在加州結識的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老人的故事，使我不禁又聯想到「窮不過三代」這句話。

那位老人現在該也八十了，是個國民黨將軍的幼子。解放那年，應該是十六歲吧。將軍全家乘火車去香港轉台灣途中，這位少年懷着革命理想，居然半途脫隊，報名參加解放軍去也。政審當然通不過，被送往靠近俄國邊境的大興安嶺伐木，在那裡與當地農民的女兒結婚成家、生兒育女，從官閥門第跌落到社會最底層。

三十年後，迎來改革開放，老人的哥哥早已從台灣移民美國、事業有成，幫助這個弟弟全家移民來到美國。一對夫妻在加州開了一家比薩小店；幾個孩子此時都已成年，也都沒有文化，胼手胝足，先是幫人打工（例如檢修汽車），後來也都成了小老闆（開「車行」等）。這還都在社會下層，但都生活有着了。有意思的是，老人的第三代，或是生在美國、或是孩提時來到美國，無一例外，都在長春籐名校受了最好的教育。不必細問：當然都已「流動」到了中層以上。這樣看來，似乎在美國，最多經過三代，確實可以流動到中產階級。

但應該記得，我們這批人來美國時都受過高等教育，而從中國的底層社會爬升到那個地位，已經經過了幾代人的努力。上述那位老人，有哥哥擔保他們來美國，更因爲那位老先生熟知受教育是向上爬升的唯一出路。這都不是一代人自己努力的結果。我們中國人，生活越是窮困，越是省吃儉用，盡一切力量使下一代在可能範圍內，獲得較好的教育。不如此做，反而會被看作不正常。但即使在這種文化下，眞正要從最低層爬升上來，從做農民工算起，跟原先城市居民競爭，能不能到第三代時實現這一提升，很懸。

看來，窮「不過三代」應該改成「至少三代」。從整個社會來講，關鍵在於先要縮小貧富差距。依靠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是不能提高經濟流動性的。

五指山（資料圖片）

高高的五指山

蔣元明

「我愛五指山，我愛萬泉河」，一首歌曲讓五指山成了中國的名山。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裡，一群女孩手拿斗笠，在萬泉河邊載歌載舞，讓海南美麗的山山水水深入人心。五指山是海南島的脊樑，是中國最南邊的山脈。到海南不去五指山，就好比到北京沒去長城一樣，會遺憾的。

從海口到儋州，再從儋州去三亞有兩條路，一條是環島高速路，一條是穿越五指山的山路。高速路好走，但路遠；山路近，卻七彎八拐，又陡又急。司機小陳問我走哪一條？我說想去看看五指山。小陳提醒，山路急、彎多，怕你一會就頭暈。我說，幾年前我穿行過青藏公路；山高路險必有好風景！

沒多久，車就進山了，那山路越走越陡，彎是越來越多，左拐右拐幾乎就是連成一氣，不死死抓住車門頂上的吊環，根本就坐不住。好在窗外風景如電影畫面閃過，如同重現紅色娘子軍穿行在高山密林……

我在海南幾乎是碰巧沿着當年瓊崖縱隊轉戰的路線前行的。五指山地區是瓊崖縱隊最後的也是最大的根據地。瓊崖縱隊的前身是一九二七年的討逆革命軍，那時只有三百餘人的隊伍，後來改稱瓊崖工農紅軍，娘子軍就其中的一個連隊。抗戰時，縱隊主力向西南地區發展，開展敵後游擊戰爭。一九四七年初，縱隊領導機關及主力一部轉至中南部，建立了以白沙、樂東、保亭爲中心的五指山根據地，最後配合、接應渡海大軍解放了海南島。

經過兩個半小時的崎嶇山道，車進到五指山市區。這是一座山谷中的城市。雖在深山峽谷裡，也是高樓林立，店舖滿街，一條南溪河穿流其中。市區只有四五萬人口，卻有大中專院校七所，還有博物館。「海南省民族博物館」建在北面半山坡上，已有三十一年歷史，巍峨壯觀。博物館佔地五萬多平方米，展廳就有二千五百多平方米，分六個展區。穿着黎族裙裝姑娘的講解，讓我大開眼界，海島的歷史也是那麼古遠，也曾那麼輝煌。元代著名紡織技術家黃道婆，曾經在這裡向黎族學習紡織技術三十多年，然後回到上海故鄉傳播發揚，才有中華「衣被天下」輝煌紡織業！

從博物館出來，市委宣傳部的小王領路上了山，從山上俯瞰這座山中城市，別有一番風景：四面青山擁立，小城如同嵌在山窩裡的明珠。這裡屬熱帶雨林氣候，冬暖夏涼，年平均氣溫二十二點四度。雖是冬季，也只襯衫一件。山頂上的太平水庫，更是鑲嵌在山城皇冠上的翡翠。太平水庫既是一道美麗的風景，也是山城的命脈。太平村的黎族同胞像守護神一樣守護着這一池清水。我問小王對黎族的印象，他說，友善，質樸，很好相處。小王是哈爾濱人，大學畢業後自己跑到這裡來尋發展，已在五指山買了房，還準備接父母來住。他說，這裡冬天也溫暖如春，與冰天雪地的哈爾濱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天驅車去到五指山主峰。站在山底舉目望去，滿目青山，高聳入雲，與井岡山一樣，是紅色與綠色的絕配；五峰並立，形同五指，如同兄弟，天然和協。小王同他的夥伴們兩年前登過五指山，上下六七個小時，累且開心着。我爬了半小時身上就冒熱氣了……

生命流沙

如是我見

有位六歲的小女孩到動物園玩，看到猛獸區有工作人員向遊客推銷與老虎合影，每次收費只要十元。小女孩希望與老虎合個影，她的父母便把孩子抱到老虎身邊，相機閃光一閃，老虎突然受到驚嚇獸性大發，將小女孩的頭咬在嘴裡，死死不敢鬆口，在工作人員拚命的擊打下，老虎才鬆開血盆大口，但小女孩已無力回天。

看到這則新聞，讓人嘆息。老虎是猛獸，是極其危險的動物，即便經過馴化，也仍然難脫野性。而動物園可以爲了十元錢，讓生命去冒如此大的風險，實在匪夷所思。

一個理性的社會，都會高度關注生命與成長，絕不會讓鮮活的生命置身現實生活裡的危險之中。所有背離這個宗旨的行爲，都是非人文的，也是非文明的。歐洲偉大的人道主義者阿爾伯待・施懷哲曾指出：「對生命敬畏的感覺是絕對的倫理。它使生命序列的保持和提升順利運作。」

著名作家王安憶說：「每每看到美國政府爲了一個戰死在異國的士兵遺骸斤斤計較寸步不讓時，一種莫名的感動自心底湧起。每每看到我們自己的生命如草芥和數字時，一種無以言狀的悲涼直達心底。在我們幾千年歷史裡，你檢測不出絲毫的關於人的概念，人的權利，人的尊嚴。沒有人在意我們的生死，包括我們自己。」

我有一位同學大學畢業後去了法國，他說在國外，校車、救護車才是城裡最安全也是最牛的車。任何交通工具都會爲他們讓道。而在中國內地，公務車才是最牛的。他在中國生活了二十三年，在國外生活了十六年。回來後，仍然是一個「憤青」，他說小時候老師經常教育我們，西方國家是資本主義，是一個唯利是圖的國度，那裡充滿了爾虞我詐，親情疏離。到了國外，他發現不是這樣的。他說，他現在回了國，有點不適應了，因爲大家談論的全是房子、汽車、情人、職位和賺錢，從來沒有一個社會像現在這樣幾乎所有人全部淹沒在了滾滾的錢慾和唯利是圖之中，他覺得這一切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還有一位朋友去了一趟澳洲，他隨旅行團來到了一個不知名小鎮，當地時間晚上十點不到，街上已空無一人，店面也已打烊了。這讓他十分詫異，因爲在國內，正是燈紅酒綠之時，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還在營業的咖啡館，朋友仗着大學裡考出的四級英語，希望進去喝杯咖啡。誰知一進門，就被服務生擋住了，說店已打烊，不接待客人了。

有生意不做，這在國內是不可思議的，但在澳洲卻司空見慣。每到周末，本應是商店做生意的時候，店面卻全都關了門，朋友說，到了澳洲，他才感覺到什麼叫「生活品質」，知道了什麼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

打鳥哲思

黃東成

自由談

小時候喜歡玩彈弓，打鳥。那時玩的彈弓與北方的正正規規彈弓不同。北方的彈弓是截一段分杈的柳枝，去皮，兩邊綁上紅紅的汽車內胎皮條，拉一把滿弓非常有勁，力道極大，唰的一聲，彈出去的石子可以打到二十米開外的目標。我的彈弓只是一個用鐵絲擰成的小玩具，手柄擰成麻花形，兩邊分杈的頭頭上，綁上用八根橡皮筋絞成股的皮條，拉滿弓也有勁，彈出的石子打到人身上，也會起個紅包。

每天放學回家，我就跟着小哥去鑽樹林。樹林在校園裡，鳥很多，最多的是麻雀，唧唧喳喳停在樹枝上，我跟着躡手躡腳貓過去，閉起一隻眼，拉弓，瞄準，啪地一聲打出去，只聽樹葉響，不見鳥下來。偶爾也有被打着的，那是牠流年不利。那次我打着的鳥唧唧唧唧從樹枝上掉下來，在地上撲騰，待我笑着趕過去，牠忽然又嗖地一聲飛走了。原來只碰着牠的尾羽，並未傷着筋骨，讓我空歡喜了一場。

小哥說，出個題考考你。我問什麼題？他說，打鳥的，數學題。我滿不在乎，你能出，我就能答。小哥出的題非常簡單：樹上有十隻鳥，打下一隻，還有幾隻？我不假思索隨口回答，九隻。小哥狡黠地搖頭，要我仔細再想想。我說不用想，十隻打下一隻，當然還剩九隻，這點題連一年級的都答得上來。小哥笑着直搖頭，他拽着我讓我瞄準樹上的一群麻雀，打一隻試試。我拉滿彈弓，一顆石子飛出去，樹上的麻雀全都驚飛了。小哥說，明白了吧，鳥是活鳥，打下一隻，其餘的還不飛走。你把腦子放靈活，不要算死帳。我愣了一下，惚然領悟，一個十分簡單的題目，答案很可能並不簡單。從此，養成我一個習慣，遇到任何問題，都不急忙作答，啓迪我，勤思索。

現時，我仍常會聽到家長出同樣的題測驗孩子的智力，答案似乎已成公式。若是忽地冒出一個異乎尋常的答案，反而會使人感到意料之外。前些年，我讀到一首詩，很短，只有六句，二十六個字，題目就叫《鳥》：

樹上有十隻鳥
打下來一隻
其餘的
仍眨眼在枝頭
靜謐
完好如初

詩寫得明白如話，一讀就懂，待細細咂出味來，使我震驚不已。我深深佩服作者敏銳的洞察力。已經被人打下一隻同類了，「其餘的」居然違反常理木然不飛走。詩並未寫牠們在打盹，我讀着卻覺得牠們一定在打盹，而且睡意深沉，不然，怎麼會那麼麻木。槍響，只不過睡眼半睜，眨巴眨巴左右看看，見並未傷着自己，於是復歸平靜，再閉上眼打盹，作牠們的白日夢，一切又「完好如初」。按如此心態，槍再響，再打下一隻，其餘的仍只會眨巴眨巴睡眼無動於衷。如果槍聲連續響下去，一隻一隻被打落，即便僅剩最後一隻了，也一定不會遠走高飛，牠們最後的命運可想而知。

心態麻木至如此程度，怎能不讓世人悲憫震駭。我感嘆作者入木三分的刻畫，將一個十分普通的智力測驗題，演繹成一首具有強烈震撼力的小詩，字數少得只有二十六個，容量卻大得無可估量。它從社會學的角度，向人們展示了一個極爲嚴肅的大題目，喚醒讀者的自覺意識，快從麻木的心態中幡然警悟。

呵，麻雀雖小，通達人性。同是打鳥的題目，竟有如此深刻的內涵、哲思。